

文廷式政治思想与学术成就述评

胡迎建

(江西社会科学院,江西南昌 330077)

摘要:文廷式主张打通古今中外,为变革时代所用;主张学术随时代而尽其变,检讨汉学、宋学之缺陷;为改进中国政治制度,他编撰《新译列国政治通考》以介绍西洋政治制度。他探求西方科技知识,以有益于“民生日用”。比较中外宗教,分析儒学、墨学之特征。引入佛家平等说分析世界万物与人类社会,对轮回说进行新的阐发。他长于史学,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考辨论述,颇具史学价值;批判清代诗学,论词学兴衰,亦有独到见解。惜其著作多为评点式,未成体系,有的书稿散佚,影响他未能成为学术大家,但他是一位思想变革与学术创新的先知先觉。

关键词:文廷式;中西学术;政治学;宗教学;史学;文献学;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0)03-0057-08

A Review of Wen Ting-shi's Political Though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HU Ying-jian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nchang, Jiangxi 330077, China)

Abstract: Wen Ting-shi advocated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China as well as foreign countries should be connected, which was used by the reform times, learning should change along with the age. He made a self-criticism on the defects in Han & Song lear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he compiled *New Translation of Various Nations' Politics* to introduc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Western world. He sought the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He compared the Chinese religion with the foreign religion,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Buddhism equality, analyzed the whole world and human society, and explained the metempsychosis thought. He was good at historiography, and collected, classified and discrimin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he criticized Poetics of the Qing Dynasty, researche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ology, on which he had original views. Because his works were mainly in critique, didn't form a system, so he didn't become a great master. However, he was a prophet in the ideological change and the academic innovation.

Key words: Wen Ting-shi;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politics; science of religion; historiography; philology; review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号云阁,一作芸阁,又号罗霄山人,晚号纯常子,萍乡人。自小聪慧过人,家学深厚,良师益友众多,这些都促成他少年成名,为时所重,也激发了他强烈的自信心和“有志尽驰骋”的鸿鹄之志。早年居广州时就开始学术活动,计划汇刻历代史志。光绪十年,日本人

收稿日期:2010-03-08

作者简介:胡迎建(1953-),男,江西星子人,江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江西古文献与诗学。

冈千仞来广州,两人晤谈学术问题,谈及东洋不可弃中国伦理纲常,论唐宋以后城市之制败坏。冈千仞在《观光纪游》中说:“此间所见士人,唯道希才气俊发,议论慷慨,尤用心家国之事,必为他日伟器。”(《笔谈》卷十五)^{[1](P1478)}早年的潜心苦读,为他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涵养,在经学、史学、小学、辞章等各种儒学传统领域都能成一家之言。同时,西风东渐的晚清社会,使这个积极用世的年青人得以“旷观各国之富强”(《读海国图志书后》)^{[1](P132)},一窥西学门径。

光绪十五年,文廷式考取内阁中书第一名。次年中进士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三月,光绪帝主持翰林院大考,钦定文廷式为一等,升四品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署大理寺卿。得到皇上赏识,他便迫不及待地施展其政治抱负。甲午战争时积极主战,支持光绪帝,奏劾李鸿章贻误战机。《马关条约》签订,条款严苛,举国震动,他遍约同人上奏抗争。与陈炽、沈曾植、康有为等维新派发起组织强学会,刊印变法报刊书籍,一时新学组织出现于南北各省,因此获罪于在朝的大批保守官僚。慈禧下令封闭强学会,迫使光绪帝将其革职驱逐回原籍萍乡。沈曾植在《怀道希》诗中将他比作汉文帝时主张削藩的贾谊:“恶草谁除蔓,芳兰不惜煎。贾生徒碌碌,一任大钧权。”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密拿文廷式。文廷式自长沙逃往日本,日本学者聘其参与撰修日本国史。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归国,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策划,失败后再度逃亡日本。归国后,病逝萍乡。

文廷式博学强识,学术视野开阔。他主张打通古今中外,认为“不读古书,不足知后世之变;专信古书,不足知后世之变”(《罗霄山人醉语》)^{[1](P801)},必须读古书而不泥古,重在经世达变。从汪叔子编的《文廷式集》(中华书局版)来看,可谓著述宏富,其中写于不同时期笔记甚多。《志林》、《闻尘偶记》、《芸阁偶记》、《琴风馀谭》皆有清一代朝野掌故,以近代为多,不少批评朝政,指斥昏庸大臣。《旋乡日记》、《南旋日记后所附笔记》、《罗霄山人醉语》、《寄言》、《芸阁丛谭》、《知过轩日钞》,皆论学笔记,涉及经、史、子学特别是政治制度、音韵文字(涉及梵文、鲜卑文、蒙古文等)、金石款识、宗教、风俗、医术等方面较多。或引古书加以按语,辩驳前说之非,或佐以实地考察,或杂谈科学知识,如电学、物理、医学、语言学、天文学。其真知灼见至今仍闪耀光辉,惜如短钉未分类无系统。还有的书稿散佚,从集中所附《文廷式著作知见目录草编》^{[1](P151-153)}来看,如其自言“欲为群经撰句例一书”,“欲编《三古战例》”,“作《双声譬况字考》”,“欲辑《天下各国古今字样》,考订周氏《汉书注补正》数十条”,然均未见存世。《晋书补逸》稿本藏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补金史宰执表》稿下落不明。现仅就《文廷式集》述其政治思想、学术成就如下。

文廷式主张学术自由,认为:“别白而定一尊,学术之所以隘也。隘则陋,而人材之奇伟者,亦暖暖姝姝而束于一先生之教矣。”(《罗霄山人醉语》)^{[1](P806)}所以士人治学要立志,否则,“谀媚盛则志气隳,志气隳则学术坏,而上又导以无用之学,下又专于不急之务”^{[1](P806)},以致天下人皆茫然愚昧,家国积弱。政治与学术关系尤为重要,所以“六朝刑戮至重而佛说盛,两宋不杀士大夫而儒术昌;西汉之五行、东汉之讖纬,皆时为之也”^{[1](P808)}。他还认为,历代学术当随时代而尽其变:

中国学术,三代以前之学,至周而大备;三代以后之学,至我朝而大备。周学极盛之后,沦为战国,九流繁兴,乃尽其变。我朝极盛之后,至于今时,海外物理之学,骎骎日盛,开汉、唐以来所未有,亦所以尽其变也。然由朴而华,由华而朴,乃天地自然之理。学问至今日开辟尽矣,沿而极者,犹可三千年;过此以往,生齿日繁,地力日竭,煤不生于山,金不生于矿,民志日弱,聪明愈衰,其必复于睢盱朴略者,势也。乃处其间,如虫蚁之生于树,而不能离树以自存;鱼鳖之游于江,而不能去水以自异,则大气鼓之,大运为之也。惟明者烛照,数计了知,如此确乎守其操而不可拔,泊乎任其化而不可移,斯乃善全其神,与天地无终始耳。(《旋乡日记后所附笔记》)^{[1](P772)}

他充分肯定清朝集学术之大全,近代以来“海外物理之学”东传而学术又一大变。他认为天地自然规律是“由朴而华,由华而朴”。认为学术至今开辟已尽,担心资源日益枯竭,人民志气减弱、聪明衰竭将导致“睢盱朴略”。这一看法似过于悲观。他还认为,人离不开所处环境,否则不能生存,必须“确乎

守其操而不可拔,泊乎任其化而不可移”,尚有积极意义。

他认为汉学与宋学均有“尚虚”症状,这是因为“敦崇气节,而不能不急求名誉;崇尚礼义,而不能不互为标榜。故其声华足以震后世,而其学术不足诏方来也”(《罗霄山人醉语》)^{[1](P813)}。他还指斥两者各持门户:

宋学之竞,以程、朱而与陆、王异说。而二百年来之汉学,则又以古文、今文之不同而大生齟齬。盖宋人重性理,性理必日浚而益深,故人多喜新,王学出而程、朱稍绌。汉学重考证,考证之学则愈古而愈奥,故人惟搜旧,西汉之学盛而东汉之学顿衰。(《罗霄山人醉语》)^{[1](P831)}

宋代理学重在阐发性理,趋于繁琐,故阳明心学兴起而稍挫其势;汉学重在训诂考证,务求古奥,故西汉黄老之学兴而东汉训诂之学反而衰弱。其分析得失利弊与兴衰,可谓高着眼法。

他对清初至乾隆间的经学渊源、师承、利弊了如指掌,在《国朝经学家法论》中进行了全面而精到的点评。最后认为:“好为新意者失之悍,其弊必至蔑前人,舍成说,而徒为纷纷;专主一家者失之党,其弊必至争门户,易是非,而不尽得其所安。”^{[1](P97-98)}对于同治、光绪间重今文之学学风,也有所针贬:

今日之言汉学者,与乾嘉时之汉学亦正自不同,小学则通假太宽,经学则多言微言大义,而于名物度数反惮其繁难不之究,又好言今文而攻古文(经学)。史学则未有宏通淹贯之才,或据摭小小,以自附于读史耳。校勘之学,差为可取。然是刊书之益,而非学者所急。至西人之学,则译书尚少,制器未多,故仅能知其辜较,而其委曲详尽之处,神奇变化之能,皆未能谙。(《罗霄山人醉语》)^{[1](P805)}

道光以来,今文经学兴起,重在发挥义理。他感叹当时学术上的变化及其弊端,认为今文经学多谈微言大义,而汉学工夫大不如乾嘉时期。史学未有大气魄,校勘学勉强可取。翻译西学之书也存在不足。又说:

格致之学盛,而五行之术衰,然古今以来决疑数学,不可废也;格致之学穷,而神秘之学起,然列国所有妖术邪教不可行也。此之消息,主张学术者宜知之,执持国政者尤不可不知之。(《罗霄山人醉语》)^{[1](P831)}

他认为科学兴盛,则五行之术衰微,但仍可用来决疑数学;科学衰微,则神秘之术兴起,却万不可让妖术邪教盛行。又说:

天地昭然,万物森著,唯物之论,其可恃矣。眩者易东西之位,聋者懵雷霆之音,故唯物之论不如唯心。虽然,唯心者转识成智,以无漏为智,则物不迁,心亦无固矣。此作圣之基也。(《南旋日记后所附笔记》)^{[1](P831-832)}

此中提出唯物与唯心的分际,认为唯物论对认识万物有用,但执着于物,又不如唯心论能将认识转为智慧。“无漏”语见《涅槃经》:“无漏之法,本无生性,是故生不能生。”

文廷式对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持强烈批判态度:“余尝谓中国政非三代,教非孔子,特美其名而托言耳。实则秦法愚民,至今用之,锢蔽日深,苛刻日甚,与高丽、越南积习不甚相远,言之可为痛心。”(《罗霄山人醉语》)^{[1](P809)}要想实现开明政治,求长治久安,必须重视战国诸子百家之说,因其“各明一义,而皆有不蔽之精神……欲为万世开太平,则管、墨、申、韩,各有可采”(《罗霄山人醉语》)^{[1](P813)}。

他对科举制度考八股的危害也是深恶痛绝的,认为八股文“困人聪明,束人议论,使天下民智不开,民力不奋”(《罗霄山人醉语》)^{[1](P811)}。所以要改变中国弊端,必从废科举开始。又极为痛恨千年来官场上的“谐媚”之习,使官员丧失了对人民负责的职责,而为统治者所操持。“‘谐媚’二字,中国数千年之病,其所以失天民之职,而为世主所劫持者,胥在于此。”正是因为文廷式以务实的态度,盱衡古今的目光,将国家兴亡置于自身荣辱之上,才能使他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养成他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的能力。

文廷式为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积极介绍西洋政治制度,历多年编译的《新译列国政治通考》于光绪二十一年完稿,七年后由上海铸古斋铅印出版。他在序中交待了编此书的缘由,乃是因为世界大势日新月异。而近数年来,学术之变、交涉之繁更倍于往昔。道光以来,介绍海外的图书,徐继畲《瀛寰志略》虽确实但太简,魏源《海国图志》过繁而近枝蔓,且只是重在地理方面,很少涉及制度。江南制造局所译各书,兵制稍详,典章制度从略。译署所译法国律例,并非通行各国的法律。而坊间所编西学“丛书”、

西国“通考”,只是重在声、光、电学等书,完全忽略国政、民风、宗教,无从考见东、西洋制度文物与治兵、理财的要略。这也就是他之所以编集此书的目的:力求问津西方制度以沿流讨源。

据《文廷式集·译述》卷三所载《新译列国政治通考》目录,此书共十一门,220卷。“学校”门二十四则,“军制”门三十则、“官制”门十六则、“刑律”门十二则、“礼俗”门二十四则、“商务”门四十六则、“税则”门八则、“国用”门四十四则、“邦交”门四则、“邮电”门四则、“宗教”门八则。“多荟蕞前人成说,又所采极博。”如“学校”门前有总论“教化”,论“五洲种族”。又有总论“学校”,在“英国学校考”下,又有学校缘起、实学课士,有伦敦各会、地方会、东方文会、格致会,有医学,有西学源流、理学源流,这些考论,可说是他对西方制度进行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在欧风美雨来临之际,还应正确看待西方制度的长处与不足,“西法有极美者,亦有未尽善者,亦有因其国之旧俗而不得不然者”(《罗霄山人醉语》)^{[1](P806)}。执政者唯有“知己知彼”,“明于各国之大势,明于五洲之性情,明于吾今日受病之处与他日病愈之效”(《罗霄山人醉语》)^{[1](P807)},才能于国家发展有益。对于“欲亟亟变法者”,他持反对态度,不主张操之过急。他说:“吾不喜顽固之守旧,吾尤不喜空浮之言新。”(《自强论》)^{[1](P135)}努力国家富强之道,改良政治,让人民参政,实行宪政,这是他的理想。至于中国应实行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他认为此时无暇论及,等到百年之后看情况的发展如何,“以君主为是者有之,以民主为是者亦有之,视其时民之材智如何,国之盛衰如何,然后有可说耳”。

二

文廷式孜孜探求西方科技知识,努力掌握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还处于无知阶段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有益于“民生日用”,对科技自身发展规律也有了朦胧认识。据他自述,他首先采用“物理”一词,专指西方传来的物理学,取代以前所用“格物”一词。此词借自晋代杨泉《物理论》二字,但非杨泉所说原意。“西洋格物之学,与中国儒者所言,有虚有实,而理自不易。故余志‘艺文’,录新译西人各书,凡言格物者,皆入‘物理类’,此‘虽不见前史,倘可为目录家所无讥乎?’”(《罗霄山人醉语》)^{[1](P809)}。对进入中国不久的“西学”,他企图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探索其中原理。如用文字学知识来解释“电”之原理时说道:

电学之理,彻天彻地,使心学家知之,能长多少识见!然圣人则先自证之,特不欲褒言之耳。故“神”字从“申”,“电”字亦从“申”;“申”者无时不申于天地之间,故麓气横而电气直也。“申”字篆文作“昌”,亦兼象屈曲洞达之形。余故疑“申”为“神”之本字矣。(《罗霄山人醉语》)^{[1](P802)}

电者神也,至于神而其用不穷,不与万物为存亡,而万物无不恃之以为存亡者也。

然吾得而断之曰:“电学之极,与佛学通而已矣。”(《罗霄山人醉语》)^{[1](P810)}

电学至今日而日精,十年以前所格之理为浅浅矣。然出入无兆,超天地而泯古今者,犹当以身实证之,不可徒恃推阐之功也。……电气所行,磁气即日与之偕,一纵一横,黄神所谓‘圆道’也。燧人以前为铁刀世界,燧人以来当为火世界,自今日以后当谓之电世界,又千百年,不知更有何新理矣。(《闻尘偶记》)^{[1](P728)}

电学的发展须重在实证,不可依赖推论。他预测未来当为电气化时代,颇有远见。又说:

近时意大利国某者创兴传电之法,可不用线。李提摩太为余言,其法用以脱而不用电,余谓后世若精于用以脱,则可以浮游地球之外矣。(《罗霄山人醉语》)^{[1](P830)}

不用线的“传电之法”大概即无线电。他能预见到人类将来可以发明无线电遥感技术,使光电“浮游地球之外”,若非具有相当的电学基础,并经过认真思考、缜密推理是不可能有此预见的。

文廷式对光学也有所认识:“光学可以传声,即耳目互用之说也。大地尽放金光,即电气镀金之说也。”(《罗霄山人醉语》)^{[1](P805)}因对显微镜功用有所了解,又预测将来必有电话、扩音器出现:“余谓既有显微之镜以显极细之形,将来亦必有察音之筒,可以令极细之声加数百倍,使人能听。”^{[1](P817)}(《罗霄山人醉语》)在天文学方面,推测有光速,因有光年:“岂独各星可以周流,即太空亦何非实境哉?且地球日行一度,人亦与之偕行;日与恒星之光,或顷刻而至地上,或五六百年而至地上,人并受其彩耀,则就此

五浊之身,而所与为缘者,实已遍周沙界,于是尽神识之用,又孰从而限之?”(《罗霄山人醉语》)^{[1](P824)} 这些,都说明文廷式对高科技的发展相当敏感与重视,这些预测性的看法,已为日后科学的发展所证实。

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他也力求明其奥秘与意义:“凡数之至难者,以比例求之而无不可得。天地间盖无一物能逃于数者也。数之所在,理即寓焉。凡理之至深者,以比例求之,而亦无不可解也。”^{[1](P811)}

他甚至还大胆要求光绪皇帝应当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在《外交日繁请编类成书以资典学开治法折稿》中说:“皇上于各式新械,亦宜随时宣取,躬自试验,以作士气,以示法程。”^{[1](P81)} 建议效仿康熙皇帝编撰《数理精蕴》的做法,“开文馆,汇纂西书”。主张注重发展算学与近代物理学,以开启民智。印度之所以落后,与此不无关系:“印度及回教文字皆精于言理,而于算学及近时格物之学皆不能摹绘尽致,国势之不振,民智之不开,未始不由于此。中国文字虽未足用,而学术则尚未开,留心政教者,则宜善思变计矣。”(《笔记(上)》)^{[1](P793)} 将发展近代数学与物理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劝当政者早日思考变革大计,可说是“科技兴国”的先声。

文廷式对宗教学颇有心得与研究。首先,要认识中外各教特点,进行比较,认为“近时宗教之事,天下一家,争竞将熄,稽求亦易于昔时,可无仇杀之衅矣。然而回教之新旧各不相难,犹有河州之役;犹太教虽欲改礼拜以同天主教,而失国之恨终不能忘。惟孔子之教上取法于尧舜,下无忤于时君,故虽有汉、宋之异同,而不致干戈之互斗,而‘儒’之字之义为‘柔’,其效固若是也”(《罗霄山人醉语》)^{[1](P830-831)}。他对清真教与犹太教的教派之争有所了解,在儒教与西方宗教的比较中,把握了儒教中和之“柔”的特征。他对历代推崇孔子仁学奉为儒教也有一段精辟论述:

孔子之学以仁为贵,墨子之学以死为能。仁者生理,东方行之;死者坚强,西方行之。百世之后,教术迭盛迭衰,未可预测,然必有教而后政成。立政者欲张教权,则恐其不利于己;不存教党,又不能行之于人。惟朱子之言,最利于君上,而不利子臣民。中国五百年一统之安,朱子有以贻之;中国数百年奴仆之酷,亦朱子有以误之也。(《罗霄山人醉语》)^{[1](P816)}

分析了儒学与墨学的不同特征,认为儒学以仁,故有生存之理;墨学舍生取死,性情坚强。又论及宗教与政治相为利用、相为矛盾的两方面。历代统治者欲推行儒教,又担心盛行而不利于统治。所以朱子之学说最能为统治者所采用,然此学虽有利于政权巩固、国家统一,但也造成了中国思想笼罩及专制之烈。所以他还批评说:“天下之教,坏于学究;天下之政,坏于吏胥。”(《罗霄山人醉语》)^{[1](P807)} 认为后世的程朱理学,并非孔教之初衷,而是托其名而行专制之实。“中国政非三代,教非孔子,特美其名而托言耳。”^{[1](P809)} 而现在如果有人效法基督教以改革孔教,欲从礼仪形式、规模上入手,则为识者所讥笑:“且有睹欧洲之修教,而愿为孔教之路德者。不知六经具存,立说偶有参差,而教规毋庸区别,徒为识者之所笑耳。见耶苏之教堂众,则欲广营孔庙;睹西俗之礼拜行,则拟增加祭期,此与儿童之争饼饵何异?”(《罗霄山人醉语》)^{[1](P831)} 这很有可能是指斥康有为主张远学德国宗教改革,创立孔教,制定一套繁琐的礼仪。在他看来,这简直就如同儿戏。

文廷式佛学修养深厚,他的《释典札记》中有《出三藏记集摘抄》、《宗镜录札记》、《华严经札记批语》,均可见他研究有素。我以为,他在佛学上有两大贡献,一是引入佛家的平等说来分析世界万物与人类社会。他说:

有等而后有平等。今之言平等者,不知等者也。或问禅家门:“佛法平等,何以这山高,那山低?”禅者答曰:“佛法平等,所以这山高,那山低。”此平等之真解也。墨者曰:“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夫既有始末,而何得谓无差等乎?斯亦以矛盾陷,不能自解者矣。有等而后有平等。(《罗霄山人醉语》)^{[1](P831)}

等等等差,因有等差,故佛教以平等心看待万物之等差。墨子虽主张爱无差等,但做法上却解决不了亲疏有别的矛盾。

文廷式于光绪二十六年所撰《平等说》^{[1](P138-140)}一文,即是对上述佛学“平等”说的深入阐述。此文的基本思想立基于儒、佛,然更为深层之观念显然源于佛学。开篇即言“世界以何成就?以差别相成就。”此中“差别相”之语,即源自佛语。然佛教在终极境界上,是主张“平等相”的。接着所言:“众缘和合,而有山川草木,风雨霜露,此客器也。”客观外界种种不同事物,乃由“众缘和合”而成,而“主器”即人

的感官亦由“众缘和合”而成。“客器”与“主器”互成互亏,互感互应,内外相接,成为“事世界”。然从佛教来看,一切“真心遍圆,含襄十方,无人我,无古今,无去来,亦无现在,固无差别相也”。有此“四无”,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固无差别相”。这是其《平等说》整个立论之基与最重要的思想核心。而“唯物者”认为“物本性自有。本性自有,则一物各有一性”,所以接受不了“差等之说”。佛学“唯识”者则认为,世间万物起于微,最后沦为微,本来并无多大差别:“识性本无,则一法不生,而差等之相无所施。且究而论之,无一物不起于极微;及其终也,亦无一物不沦于极微。即使计极微为常,而天地间形形色色,果何所用其差别乎?”他认为“出世法”如是看世界,“世间实相”也确实如是。从极微之论而推出无差别的平等之相,有其合理的逻辑基础。文氏支撑此“无差别相”的基本原理,是立于“识性本无”与“极微”之论的。因为“人事”有“至不平之相”,而“欲求所以平之,而等之名以立”。因为有不平而求平,则有等之名。然后他考察不平即差别形成之因说:

开辟之初,混沌沌沌,茫茫昧昧,无所为君,亦无所为臣民焉而已。俄而为争焉,则推其雄猛者尊之。其争之又有大焉,则又择其尤魁桀者而奉之。或争而不已,则为其长者,必为主修战斗之器,讲进退之法,使一统十、十统百、百统千、千统万。而阶级由此而生,号令由此而成。如是久之而有朝廷;有朝廷而有官制;有官制而文之有礼乐,齐之有刑罚。此邦国之等差也。其行于家者,墨学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夫既由亲始,则有始末之序;有始末之序,即等差之辨也。盖观于禽兽而知母子之爱,为最初之义。以是推之,其爱有浓淡,即其事有浅深。因设为礼教,以扩充之;制为丧服,以节度之;为之祭祀,以绵永之,而家之等差著焉。然则,凡等者起于人事,即事世界所由安立也。顾等差如是,分别如是,而平等之谊即在于是。尧舜以迨孔子,相传之道曰“执中”。执中者,平等之极也。如衡物焉,左右如一;如衢路焉,前后各半,斯之谓“中”。中无定在,数之三者,二为其中;数之九者,五为其中,则因时之大义、制事之达道。(《平等说》)

原始社会,因有纷争而有了强有力者为仲裁,这是首领出现的原因。也因而有了阶级,有了朝廷,有了官制礼乐刑罚。有了家庭、爱有差别,既有亲始,则有始末次序,也就有了规范先后次序的礼教,有了丧服祭祀等内容,差别等级也就产生了。他对远古的推测有类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起源的学说。正由于人间有差别,因而就有了将差别平等的“执中”之儒学,他明察儒家的“执中者,平等之极也”之说,驳斥了墨子“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之说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他还说:

凡君民之际、父子之间,沿袭之久,而有畸轻畸重之弊者,皆不得其中道。不得其中道,即不得其平均,而等且将由此而淆。故夫论事者宜知随时之中,则知救时之要。非徒守古义、徇今俗,断断于口舌,而自以为得也。且夫圣人智矣,而谓聚千万人之神识,竟无一人可优入圣域者,可乎?儒者曰:“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为尧舜。”佛者曰:“众生即佛,佛即众生。”此平等之说也。而基督教则未尝许人以皆可为雅素(即耶稣)也。此雅素主张平等而实不平之极也。(《平等说》)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佛家以为“众生即佛,佛即众生”,而基督教虽然主张平等但并不让人都能成为耶稣,不能达成真正的平等。他试图在儒佛两家找到共同点,亦即他建立平等之说的根据。而更具进步意义的是,他试图以平等说去反对君主专制独裁。统治者之尊,不过是其职责造成的,而就器官与生理来说,与庶民并无差别。他的平等之说是以无等差之说去打破万物的等差,此说主要立基于佛学,并以儒家之说以证之。

其二,他对佛教轮回说进行了新的阐发。他作譬喻说,物体在温度作用下,由液态变为固态,或由固体化为液态,这种轮回,常人能识,而灵魂之轮回,唯佛眼能见:“寒极则流质皆凝,热极则坚材悉化,此人目所见之轮回也。出此躯壳,入彼躯壳,经此世界,过彼世界,此佛眼天眼所见之轮回也。”(《罗霄山人醉语》)^{[1](P811)}佛教“轮回”之说,乃佛家“数百年积思之所悟、神光之所照”。佛教认为物质早在天地产生之先就已存在,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在天地造化中使之处于变化状态中。而一人与千万人之生理相同。若一死而同归于无,则人类更为自恣妄为。有了轮回之说,也就有了佛教的投生之说。朱熹不全盘否定轮回之说,而钱辛楣认为佛教之说将使父子不亲。但文廷式认为儒教解释不了生前与死后的问题,难以立教。而轮回之说或能有助于解释生死问题,故能立教。佛教将宇宙归之于“无始无终”,未受

“多元”、“一元”说之牢笼,大得文廷式推崇:“哲学家有多元、一元之分,《易》言乾元统天,故日本人以儒家为一元之学,唯释家以无始无终言之,可谓不囿于群学者矣。”(《罗霄山人醉语》)^{[1](P830)}。可见,文廷式认为佛学能包涵广大而不为群说所束缚。

三

文廷式长于史学,所纂《黄帝政教考》,收入《文廷式集·史志》卷五,据此文题下注云,此件手稿作者原有“世系考一卷”、“政治考二卷”、“学术考五卷”、“事迹考二篇”等字样。将古文献中凡涉及到黄帝的史料进行汇考,每加以按语,如引《管子·五行篇》后按:“此可知古者‘明堂’阴阳家之方,《管子》此篇盖出于《黄帝泰素》也。”引《灵枢·九针论》后按语:“一而九之,为尖堆术之始;九而九之,为开方术之始,黄帝所以开数学也。”^{[1](P642)}对所有相关史料进行甄别,辨明出处,不明者予以存疑表明学者求真务实的态度。

文廷式在目录学方面成就巨大。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光绪七年应于秋枚之约,计划汇刻历代史书中的志,事虽未成,但从《拟汇刻历代史志凡例》^{[1](P555)}中即可见其史才史笔,每一部史志,何者宜删,何者宜补,何者宜改撰,均有论断,并拟附图。且对志体评点精严,如言“《金集礼》之简严,《元典章》之赅备。长孙《唐律》式微,欧史之疏,王溥《会要》足补薛书之阙。述地理,则《元和郡县》开《太平寰宇》之先;语天文,则《开元占经》为《乾象通鉴》之本。固当摭其大要,入我范围,订柱下之遗文,作枕中之鸿宝。”^{[1](P557)}如果此书刊印成功,则“得失之林备,专门之学精,宏取法于后王,甄定论于曩昔”。其时他先行完成《补晋书·艺文志》六卷。自述谓“典午一朝,文学弥盛,昔尝纂录《隋志》及群书所引书名可考者凡一千余种”,以补《晋书·艺文志》之缺。

文廷式对清人著述也特别留意,曾将《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清人著作编为《国朝艺文志》,共三千种十一万卷有奇,稿藏家中,后来游日本期间,又得前所未见者,补录编为《国朝诸人著述目录补编》。在《国朝名人著述目补》题记中自言其甘苦:“随见随录,或有与原目重出者,当删去;记忆不真者当检查,当补目。志一代艺文,固非易事,以吾书为底本,胜于尤西堂《明史·艺文志稿》,则可自信耳。”惜此类著述未见刊印。

清末学术界,学者研究西北史地之风盛行。光绪十三年前后,文廷式作《〈元史〉西北地附录考》,将西域、蒙古一带诸地名进行考证,后世地名为何,地理方位在哪里,引用诸史与子部、集部书籍如《经世大典图》、《秘史》进行考证,也有的是与好友沈曾植探讨所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指出至清末其地名为何,有的则纠正了前人的考证之误。如“柯提”,李仲约以为是“阿体八升山”,文廷式在案语中认为“阿体八升”当为“阿特八失”之对音,并非此地。又“低廉”这一地名,他转述沈曾植所说即今波斯语“麻散豆兰”,但他又在按语中说,“疑即《辽史·百官志》之‘迪烈德国’,亦曰‘敌烈’者是也”。并引郑晓《四夷考》中资料,认为“迭里迷”即“低廉”之音转(《史志下》卷五)^{[1](P589)}。可见他治学之严谨。柯劭忞说《元史》中的西北地名考四家,洪钧、屠寄、陈焯与文廷式学士,“学士说‘西模娘,即《辽史》之仙门国,最精审,为他家所不及”^{[1](P589)}。

光绪三十年冬,文廷式去世。陈三立在《文芸阁学士同年挽词六首》第五首中提及此年春两人一同乘船自南昌至江宁情景:

流略久湮沦,群喧妒道真。校文向歆后,随笔孔洪邻。

双树从微喻,孤篷更暂亲。枕中宗教记,搜证恐无伦。^{[2](P132)}

他认为文廷式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能承汉代刘向、刘歆之后,随笔可与宋代孔平仲、洪迈相比。第三联中“双树”即娑罗双树,为释迦牟尼入灭之处。“孤篷”言同船时两人的亲近。末联认为文廷式有关宗教的笔记,其搜集资料、考证本领,时人无可比伦。并有注云:“今岁四月,与君由南昌同舟抵金陵,得阅所著杂记,中有述宗教数卷,可谓奇作。”

文廷式在诗词创作方面成就非常高,但他的诗论不多,只有数条笔记涉及。他对清代诗学持批判态度:“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

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说。风雅道衰,百有馀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辈,尚近于诗,亦滔滔清浅。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旋乡日记后所附笔记》)^{[1](P736)}从这段文字来看,他以“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为至上境界。而清诗弊病在于学究性,曲行阿谀,清浅,更次一等为繁琐好用典。指斥沈德潜倡别裁说而损神理,纪晓岚批苏轼而损天趣:“本朝诗学,沈归愚坏之,体貌粗具,神理全无,动以‘别裁’自命;浅学之士,为其所劫,遂至千篇一律,万喙雷同。至纪文达之批苏诗,逞我臆谈,损人天趣,风雅道丧,非此种论议取其咎乎?”(《琴风徐谭》)^{[1](P784)}而对当时“诗界革命派”好以新名词入诗极为不满,在《浩山诗集》评语中说:“不必趋新派、作集字诗。新诗取悦一时,不久即当寂灭,终必以唐宋诸大家为归,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文录》)^{[1](P154)}

他对词学的评论主要见于《云起轩词钞序》^{[1](P155)},认为南宋词最盛,也至南宋而衰,其衰弱的原由乃是因为“其声多啾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而清代词学复振,大家辈出。但清初朱竹垞宗张玉田,所选《词综》一书,偏重于吴梦窗、王沂孙一派,视辛稼轩、刘过为仇讎,造成意旨枯寂、字句冗漫之流弊,不为笼络者甚少,幸有“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蒋鹿潭有沉深之思,成容若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在肯定诸人成就的同时,指出其不足,可见文廷式本人对创作的高标准,即取法于辛词,而笔意力求沉著。

文廷式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法眼犀利,抱有强烈的救国热情,借用他评价清词作者能“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1](P155)}一语,恰可形容他的学术胸襟与气度。处于政治制度转型之时,学术由近代迈入现代的前夜,他积极引进西方学术包括科学以改进中国政治与学术。他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是猛烈的,甚至对统治者提倡的朱子理学也时有贬斥,可说是揭示了在提倡背后的真面目,时有真知灼见,不同凡响,惜多为评点式,未成学术专著体系。近代大学者沈曾植《文君云阁墓表》对他的学术有恰当的评价:“窃尝以为先汉微言、东京纬侯、魏晋玄风、宋元儒理,以君识学所积,专精一业,无不足以名家。顾君以资平议而已,终不屑屑纂述。君才于史部为尤长,穷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难鼎足。晚颇亦有意于是,而日薄崦嵫,盛业不究,竹帛所存,千百什一。君所论内外学术、儒佛玄理、东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归本,积微以稽著,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九州百世以观之。呜呼!岂得谓非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哉!”(《序言》)^{[1](P3)}沈曾植指出他在中西学术、儒学、佛学、教育制度、人材学、政治制度特别是史学方面的成就,敬佩其学识之丰富,敬重其学不事依傍,不阿时风。认为如果文廷式专攻一家,著书立说,或可与顾炎武、钱大昕鼎足而立。的确,文廷式有不少文献考证、目录方面的纂述,本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著书立说,但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积极变法以用世的主张不能见容于后党,成为被驱赶被捉拿的另类,以致颠沛流离,加以天不假年,还有一些所编书稿未能刊印而遗佚,最终影响了不能成为一位学术大家。但如果放在大变革的政治转型期来观照,其学术见识又有不少具有预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社会变革与学术创新的先知先觉,其贡献是了不起的。本文仅就其对学术史的见解、中外政治制度、引进西方科技方面的见识、宗教学、史学、文献,旁及诗学词学方面的成就略作述评,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参考文献:

- [1]汪叔子.文廷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散原精舍诗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张立荣)